

章太炎传

许寿裳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草太炎传

许寿裳
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章太炎传 / 许寿裳著 . 一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
2004

ISBN 7-5306-3873-4

I. 章… II. 许… III. 章太炎 (1869 ~ 1936) —
传记 IV.B25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458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 定价：15.00 元

前　　言

——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

陈平原

一 文学家还是著述家

作为教育家的许寿裳，已经日渐隐入历史深处；而作为章太炎弟子、鲁迅挚友的许寿裳，则仍然为广大读者所记忆^①。这自然是“立言”的结果——只要你稍微涉猎章太炎或鲁迅研究，就很难回避许先生所撰《章炳麟》（本书更名为《章太炎传》，下不再注——编者。）（1945）、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（1947）、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（1947）、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（1952）等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说“许寿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”，或者称“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

① 许寿裳（1883—1948），字季黻，号上遂，浙江绍兴人，1899年春至1902年夏，在杭州求是书院从宋平子等学习。1902年秋，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时结识鲁迅，结成终生友谊。留日期间，曾主编《浙江潮》、与鲁迅等筹办文艺杂志《新生》、与鲁迅等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。1909年4月归国，投身教育界。除曾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工作外，主要在北京大学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中山大学、华西大学等校教书。1946年应邀赴台，任省立编译馆馆长。第二年编译馆撤销，改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。1948年2月18日在其寓所被害。

家、作家”^①，也无不可。

不过，一般人所理解的“文学家”，大都是才情横溢、文采风流，与许先生的诚挚、笃实、平淡、自然，相去甚远。更何况，许先生不以驰骋想像见长，所撰多为“实录”性质的传记或回忆录。因此，称其为“著述家”，或许更稳妥些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转化视角，在学术史上，而不是在文学史上讨论许先生的贡献。

去年逝世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，对许著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等赞不绝口，称其“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，而文笔淳朴，亲切动人，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”；而近年活跃于学界及文坛的孙郁，对此也深有同感：“我读许氏的著作，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，内中有着质朴、纯正的风韵。许寿裳国学根底深，又通西学，故对鲁迅的感知，视界开阔，不拘于凡俗。虽然缺少哲人的目光，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颐有限，但对其人品、文风、境界的把握，独到深厚，非外人可及。”^②对于这些表彰许著的文字，我心有戚戚焉；只是谈到单靠这几本好书，能否“使许先生厕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家之林而毫不逊色”^③，我始终有些犹豫。

说白了，我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文学才华，其实是颇有怀疑的。与鲁迅、许寿裳交往甚多的孙伏园，曾用小说笔法，讲述

① 参见林辰《〈许寿裳文录〉编后记》(《许寿裳文录》，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6)及倪墨炎、陈九英《〈许寿裳文集〉编辑说明》(《许寿裳文集》，上海：百家出版社，2003)。

② 参见林辰《〈许寿裳文录〉编后记》及孙郁《许寿裳的文字》(《书摘》2000年6期)。

③ 参见林辰《〈许寿裳文录〉编后记》(《许寿裳文录》211页)。

许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逸事：

在东京求学时代，鲁迅先生兄弟与许先生同居一处，许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，亦颇有志于创作。一夕，他对鲁迅先生说，今晚一定要创作了。鲁迅先生见他亲自到西洋料理店去买了点心来，而且亲自准备咖啡，鲁迅先生兄弟相约不要去扰乱他。等到夜深人静，鲁迅先生将要睡觉的时候，偷偷地去窥探他的创作已经有了多少。出人意料，鲁迅先生说，“西洋点心只吃了一块，咖啡已经冷了，季黻靠在桌上睡着了，而稿纸还是空白的。”^①

既然是逸事，难免没有“艺术加工”的成分。不过，如果了解当初许寿裳曾与周氏兄弟等相约，筹办《新生》杂志^②，这故事或许还有些影子。我甚至还怀疑，这故事的讲述者，很可能就是鲁迅，因其幽默中包含着善意，不伤人，但很能见性情。

本不以文学见长的许寿裳先生，受尊师章太炎的教诲、挚友鲁迅的感染，再加上那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养，一旦著述，颇见神采。换句话说，许先生回忆鲁迅等书之所以可读、可传，“工夫在诗外”。因此，我主张暂时搁置其“文学技巧”或“修辞手法”的探讨，也无须汲汲于将其抬进本就相当拥挤的“文学殿堂”。

① 孙伏园：《许寿裳先生》，1948年3月4日成都《新民报》（晚刊），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1047—1050页。

② 参见鲁迅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（《鲁迅全集》1卷415—420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）及许寿裳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20—21页，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7）。

二 从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到《章炳麟》

读过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的，大概都会记得该书第七节“从章先生学”。此文以及鲁迅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、周作人的《知堂回想录·民报社听讲》、任鸿隽的《记章太炎先生》、刘文典的《回忆章太炎先生》等^①，都涉及了令人神往的章太炎东京讲学。其中，许寿裳的“追忆”是“始作俑者”。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明明迟至1947年方才出版，为何将其置于鲁迅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之前？那是因为，“从章先生学”一节的轮廓，其实早就见于十年前的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。

熟悉鲁迅著述及史迹的朋友，大概都知道，鲁迅撰于1936年10月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与许寿裳撰于1936年8月的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^②，关系极为密切。一强调“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，同时是国学大师”^③，一称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”^④，二者互相发明，配合默契。细读文本，你还会发现，鲁迅的引录《狱中赠邹容》、《狱中闻沈禹希见杀》二诗、摘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（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，增进爱国的热肠”），

① 上述诸文，均收入笔者与杜玲玲合编的《追忆章太炎》（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，1997），请参阅。

② 许寿裳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一文，1936年9月同时刊载于《新苗》第8期和《制言》半月刊25期。

③ 许寿裳：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，见《追忆章太炎》50页。

④ 鲁迅：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6卷545页。

以及专门提及章先生为八人小班讲授《说文解字》等，都是依据许寿裳文章提供的资料。

叙述角度颇有差异，文章境界也显高低，但鲁文基于许文的提示，这点毫无疑问^①。撰写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这篇名文前半个月，鲁迅曾给许寿裳去信，其中有曰：

得《青苗》，见兄所为文，甚以为佳，所未敢苟同者，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。

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，卅年前事，如在眼前。因思王静安没后，尚有人印其手迹，今太炎先生诸诗及“速死”等，实为贵重文献，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，汇印成册，以示天下，以遗将来。^②

章太炎的狱中诗，许寿裳编《浙江潮》时曾予以刊出，“原纸至今藏在行箧，弥可珍惜”；至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，许文竟抄录了整整四页，原因是：

此演说录，洋洋洒洒，长六千言，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，全文曾登《民报》第六号。而《太炎文录》中未见收入，故特地多抄如上。^③

① 许寿裳称：“我知道鲁迅的那篇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是看了我的这篇纪念文才作的。因为我文中引用了先生的狱中诗，鲁迅跟着也引用，故有‘卅年前事，如在眼前’的话。”（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45页）

② 鲁迅：《致许寿裳》，《鲁迅全集》13卷431页。

③ 许寿裳：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，见《追忆章太炎》57页。

许寿裳的这些追忆，显然很让鲁迅动容，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陈年往事。对比鲁迅之抱怨浙江所刻《章氏丛书》，“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，竟多被刊落”，以及称“先生手定的《章氏丛书》内，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”，“其实是吃亏，上当的”^①，与许文的上述表达，可谓若合符节。

至于鲁迅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的“欲以佛法救中国”，指的是许寿裳文章中的这么一段话：

现在中国虽称民国，而外侮益亟，民气益衰，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，猥贱诈伪，视清末或且加甚，自非一面提倡佛教，“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，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，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，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”（先师《答梦庵书》中语，见《民报》第二十一号），一面尊重历史，整理国故，其不善者改良之，善者顶礼膜拜之，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心，前路茫茫，何能有济？

对于鲁迅的批评，许寿裳是口服心服的。日后所撰《章炳麟》一书，虽设专节谈论章太炎“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”，却不再发挥“佛法救国”的空想了^②。

其实，这段“公案”，许寿裳本人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第十三节“看佛经”中，已经公开挑明。除了全文引录鲁迅去世

① 参阅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及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二文，分别见《鲁迅全集》6卷547页、558—559页。

② 《章炳麟》一书的第十节“编辑《民报》时期”，描述章太炎“欢迎会上发狮子吼”，基本来源于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，唯独删去欲以佛法救中国的那段议论。

前 24 天写的这封长信，许寿裳还对同是读佛经的太炎先生师徒，下了这么个断语：“先生和鲁迅师二人，对于佛教的思想，归结是不同的：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，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。”^①

三 兼及“革命元勋”与“国学大师”

从善如流的许寿裳先生，显然很看重鲁迅的这封回信，日后撰写《章炳麟》，不只不再妄谈佛法救国，更重要的是，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，希望其不被“国学大师”所遮蔽。在我看来，许的这一坚持，与其对鲁迅的尊崇与信任大有关系。

1944 年 9 月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来信，邀请许寿裳为其主编的丛书“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”撰写《章炳麟》一书。虽“山居无书参考，颇费踌躇”^②，许还是当仁不让，开始四处寻觅资料。好不容易借到 1936 年《制言》杂志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^③，上面既有许的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，也有诸多师友的怀念文章，《章炳麟》的撰写，这才得以顺利展开。半年后，全书杀青，在寄稿的同时，许寿裳给潘公展去信（1945 年 3 月 31 日），郑重声明：

章先生为革命元勋，同时为国学大师，世人仅注意后一点，不足以明真相，拙稿双方并重，而文字力求简要，删

① 参见许寿裳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44—46 页。

② 许寿裳：《致潘公展》，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 910 页。

③ 参见许寿裳致王治秋、朱镜宙、苏渊雷等信，分别见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 905 页、913 页、915 页。

而又删，成此字数。^①

同年11月，应邀为《教育全书》撰一万五千言的“章炳麟传略”，交稿时，许寿裳同样奉上一“附带声明”：

章先生为国学大师，著述精深独到，三百年来无第二人，贡献于学术上及教育上者甚大。又为革命元勋，惜世人多不明了。今拙稿于此双方兼顾，而文字力求简要，删而又删，故不超过所限字数。^②

如此叮嘱再三，可见许先生对此兼及“学问”与“革命”的论述策略，是何等重视。

主编“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”丛书的，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，将章太炎置于第三辑“学术先进”，很大程度是全书体例使然。潘公展为这套丛书所撰“编纂旨趣”称：“我认为建国文化是建筑在两大基础上：第一是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，从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学工艺，迎头赶上。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个基础上的许多基石之一。”^③至于选择“基石”的标准，不外传统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与此相适应，也就有了第一辑“民族伟人”、第二辑“历代贤豪”；第三辑“学术先进”的区分。

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，或者当时已成名家，或是日

① 许寿裳：《致潘公展》，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911页。

② 许寿裳：《致姜琦》，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920页。

③ 潘公展：《“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”编纂旨趣》，见《章炳麟》卷首，南京：肿利出版公司，1946年。

后大有发展。1946年南京版《章炳麟》后面，附有该丛书的总目，值得选摘（括号里面是该传的作者）：第一辑“民族伟人”共九种，包括黄帝（钱穆）、孔子（黎东方）、秦始皇（顾颉刚）、汉武帝（缪凤林）、唐太宗（罗香林）、明太祖（吴晗）、孙总理（邹鲁）等；第二辑“历代贤豪”共十五种，包括勾践（卫聚贤）、诸葛亮（祝秀侠）、武则天（蓝文徵）、岳飞（邓广铭）、文天祥（王梦鸥）、郑成功（郑德坤）、洪秀全（罗尔纲）、林则徐（魏应祺）等；第三辑“学术先进”共十五种，包括老子（张默生）、墨子（罗根泽）、屈原（游国恩）、司马迁（汪辟疆）、韩愈（李长之）、玄奘（苏渊雷）、徐光启（方豪）、顾炎武（谭其骧）、曾国藩（萧一山）、梁启超（吴其昌）、章炳麟（许寿裳）等。细察丛书的整体框架，置章太炎于“学术先进”，定位其实相当准确。况且，对于许著的兼及“革命元勋”与“国学大师”，主编并无异议。

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，好处是见闻真确，态度虔诚，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；可也面临很难回避的陷阱，那就是“为尊者讳”，拼命拔高，言过其实。比如，称“章先生学术之大，也是前无古人”，这样的说法，便很难让人信服。好在接下来的具体评说，还是很有见地：

独有先生出类拔萃，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，然而以朴学立根基，以玄学致广大，批判文化，独具慧眼，凡古今政俗的消息，社会文野的情状，中印圣哲的义谛，东西学人的所说，莫不察其利病，识其流变，观其会通，穷其指归。“千载之秘，睹于一曙。”这种绝诣，在清代三百

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，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。^①

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读者很容易发现，这些品鉴，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。这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：熟读《章氏丛书》，大量摘引原文。如此“以章说章”，对于学术评传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。其实，这种写作，大有来头，追摹的是黄宗羲、全祖望的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等。

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提及清代的谱牒学，称自撰年谱价值最高，其次便属“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”，“因时近地切，见闻最真也”。而“可以观一时代思想”的“学者之谱”^②，要想写好，并不容易：

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，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（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，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），贯穿钩稽，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。不宁惟是，凡与
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，悉当留意。
不宁惟是，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，无一可以忽视。^③

以我的观察，许寿裳之为尊师作传，所凭借的学术资源，并非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“传记文学”，而是清人的“学案”以及梁启超所评述的“学者之谱”。

《章炳麟》一书，最见功力的，无疑是“革命元勋的章先

① 许寿裳：《章炳麟》2页，重庆出版社，1987年。

② 朱维铮校注：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468—473页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③ 朱维铮校注：《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》478页。

生”和“国学大师的章先生”两章。可第一章“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”，这大帽子的功能，一如梁启超所说的：“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，无一可以忽视”；至于第四章“先生晚年的志行”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、学术兴趣以及政治立场，是全书的补充，也是必要的强调。全书的结构很特别，始终将政治史与学术史的思路扭结在一起，不即不离。落实到具体事件，便是不完全遵从时间顺序，随时“按下”与“提起”。比如，第二章讲述章太炎《民报》时期的工作，故意按下最为精彩的为鲁迅等讲学不表，留给了第三章，以便突出其“革命不忘讲学”（第十四节的题目，真的就叫“革命不忘讲学”）。而在第四章设“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”专节，既符合全面抗战这一著述背景，同时再次凸显全书宗旨：章太炎不仅仅是“国学大师”。考虑到丛书第三辑的命名——“学术先进”，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。

四 传记文学与师友情谊

在追忆许寿裳先生时，孙伏园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们，既不忘师说，也不泥师说，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，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。”^①笼统地说许先生学业有成，那没问题；可要说章太炎的弟子中“不泥师说”且“日有进境”者，许先生其实算不上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宣统二年（1910）则，提及亡命日本时之“提奖光复，未尝废学”，称：

^① 孙伏园：《许寿裳先生》，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 1047 页。

弟子成就者，蕲黄侃季刚、归安钱复季中、海盐朱希祖逖先。季刚、季中皆明小学，季刚尤善音韵文辞。逖先博览，能知条理。其他修士甚众，不备书也。^①

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，评论时事以及品鉴人物，不太受流俗影响。在“自定年谱”中，不提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，有政治立场歧异的缘故；但更重要的是，从专业角度考量，这三位“文化名流”都不能算是其“得意门生”。鲁迅说，“先生的音容笑貌，还在目前，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”^②，并非只是自我调侃。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，主要在思想与人格，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。鲁迅撰有《门外文谈》，也有编《中国字体变迁史》的计划，但并非以此名家：许寿裳去世前一年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讲授“文字学”，课余编著《文字学概要》讲稿^③，可也说不上光大师门。

作为学者的许寿裳，虽有若干教育学文章，以及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、《历代考试制度述要》等著作传世，却都说不上十分精彩。真正让读者难以忘怀的，还是《章炳麟》、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等传记作品。好友台静农在《追思》一文中，提及许先生谦冲慈祥、临事不苟的个性，以及弘通致用的学术风

① 章炳麟：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14页，香港：龙门书店，1965年。

② 鲁迅：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6卷546页。

③ 参见许世瑛《先君许寿裳年谱》（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1107页）及叶庆炳、陈诗礼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许老师》（《台湾文化》3卷4期，1948年5月）。将近三十年后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许先生的《中国文字学纲要》手稿（1975年），我想，主要目的在追怀先辈，而非表彰学术。

格，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：

先生一生与章太炎、蔡子民、鲁迅先生关系最深，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，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，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，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，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，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，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，事变之来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^①

称许寿裳乃“一代文献所寄”，表彰其“长于传记的文笔”，我以为是知人论世。实际上，日后学者之褒扬许先生文章“朴实淡雅，具有一种自然之美”、“言简意赅，毫无渲染”、“他的叙述既客观，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”等^②，指的也都是这几种传记作品。

说到“传记”写作，自然不能忽略许先生曾在大学开设“传记文学”课程。据许世瑛编《先君许寿裳年谱》，我们知道，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时，许先生开设的课程是《传记研究》和《中国小说史》；同年5月2日撰有《谈传记文学》一文，只是未详出处^③。可以说，在生命的最后十年，许寿裳的学术工作，主要围绕传记的研究与写作。至

^① 台静农：《追思》，《中国作家》1卷3期，1948年5月，见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1071—1074页。

^② 参见林辰《〈许寿裳文录〉编后记》（《许寿裳文录》214页）、孙郁《许寿裳的文字》及倪墨炎、陈九英《〈许寿裳文集〉编辑说明》。

^③ 参见许世瑛编《先君许寿裳年谱》，见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1094—1095页。

于具体成果，除了广为人知的章太炎、鲁迅的传记，还包括《〈宋平子先生评传〉序》、《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》、《蔡子民先生的生活》、《俞曲园先生的思想》和《李慈铭〈秋梦〉乐府本事考》等。单从表面上看，文体五花八门，有序，有考，有回忆，也有评述，但大的思路相当一致，那就是借对于乡里先贤或师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，展开人物研究。广义地说，这些都可以称作“传记写作”。

读袁珂的《悼忆许寿裳师》，我们大致能领会到，许寿裳先生的“传记文学”课程不是很成功。只有两个学生，可“许师却丝毫不苟，每上课前一定要在图书馆里钩稽群籍，作充分的准备”；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，面对如此难堪局面，“许师却从容一如平时，干脆不去写黑板了，而把他写好的讲义，放在我的课桌上，亲身站在我面前，认真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来”^①。这些描述，固然显示许先生教学的认真，以及处变不惊的绅士风度，可另一方面，也让我们体味到其内心的寂寞。许先生认真编写的“传记文学”讲义，未见行世；但这一不太成功的“研究”，对其写作却很有意义。

要说许先生的传记写作，相对于学术准备，我更看重的是“师友情谊”。孙郁表扬过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的文采与气象，后面还有一句：“鲁迅有这样的知己，可谓幸事。”^②这是从著作方面立论；反过来，正因为有了鲁迅这样的知己，方才成就许寿裳的文章。文章的好坏，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，但与描写对象不无关系。全祖望《梨洲先生〈思旧录〉序》，劈头就是：

① 袁珂：《悼忆许寿裳师》，《许寿裳文集》下卷 995—1002 页。

② 孙郁：《许寿裳的文字》，《书摘》2000 年 6 期。